

术与电力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4.2 技术层面路径

数字赋能已成为电力能源行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技术支撑层面，亟需系统性强化数字技术创新研发，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5]。通过开发高效率数据分析算法，显著提升对电力能源系统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能力。而创新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实现发电设备故障的高精度预测与诊断，为行业技术升级提供核心支撑。同时，推进数字技术与电力能源业务的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的关键路径，需将数字技术系统性嵌入电力生产、传输、分配及消费的全链条，构建智能化电力系统。在发电环节，通过数字技术优化设备运行参数，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效率，在输电环节，应用智能监测与控制系统增强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在用电环节，构建用户与电网的智能互动机制，引导用户实施科学用电策略，实现能源消费的智能化管理。此外，构建电力能源大数据平台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需整合电力生产、市场交易及用户用电等多源异构数据，实现数据的集中化存储与高效管理。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促进跨主体数据的共享与协同应用，能够为行业规划决策、运行优化及市场监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从而加速推动电力能源行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奠定技术基础。

4.3 企业层面路径

在电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电力企业作为核心实施主体，亟需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企业应基于自身业务特征与发展目标，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数字化转型规划，明确各阶段技术应用的重点领域与关键任务。具体而言，可优先聚焦发电环节的智能监测系统建设，逐步向输电、配电及用电全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延伸，确保转型路径的科学性与实施的可持续性。而构建高素质数字化人才梯队是提升企业技术应用能力的核心支撑，企业应建立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定制化内部培训提升现有员工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业素养。同时，积极引进高端数字化技术人才，优化人才结构配置，同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绩效考核与创新奖励制度，激发员工的主动创新意识，营造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文化环境。由于深化与数字技术企业的协同合作是实现技术赋能的关键路径，因此，电力企业凭借丰富的行业实践与业务场景优势，与数字技术企业先进的研发能力形成互补，通过联合研发项目、共建产业创

新平台等机制，推动数字技术与电力能源业务的深度融合。双方协同攻关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开发具有应用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有效促进电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与质量提升。

4.4 市场层面路径

在电力能源行业迈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在市场机制的优化中，构建公平、开放且有序的市场环境，明确数字技术在电力能源全链条应用的规范与标准，可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数字赋能实践，促进资源向绿色低碳技术领域高效集聚^[6]。具体而言，建立高效透明的绿色电力交易机制，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终端用户间的直接交易，通过精准计量与实时监测确保生产、传输及消费全过程的可追溯性与可认证性，从而稳定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市场预期，提升用户对绿色电力的消费意愿，有效优化能源结构。同时，推动能源金融创新是加速转型的重要保障，金融机构应针对数字赋能项目特性，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及碳金融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为电力能源行业数字化应用提供充足融资支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与风险，强化金融对产业转型的支撑作用。该机制协同推进，将显著提升电力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实施效能，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可持续动能。

5 结语

在电力能源行业，实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选择，为此，需从政策、技术、企业以及市场等多个层面进行，才能不断探索创新其应用模式和发展路径，以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技术赋能作用，为实现“双碳”目标，以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曹金华,周小勇,卢奇,等.电力能源绿色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3,28(02):243-250.
- [2] 胡适.中国能建推动对外设计咨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国际工程与劳务,2021,(04):41-43.
- [3] 开拓新时代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之路——2021年全国两会中的电力能源观察[J].当代电力文化,2021,(03):10-11.
- [4] 李龙,史彤彤.数字赋能电力品牌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路径研究——打造数字化+品牌化的品牌服务基础[J].中国品牌与防伪,2025,(17):160-162.
- [5] 潘孝军.数字经济赋能曲靖光伏产业提质增效的内在机理、实践进路与路径选择[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5,44(06):97-102.
- [6] 张新文,桑园.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J].学习论坛,2025,(06):72-83.

“Maximum One Trip”: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of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in Zhejiang

Ziyou Qi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Zhejiang Province's "One Visit at Most" reform as a paradigm of government reform, analyzing the driving mechanism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outcomes of local government reforms in the digital era. Firs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grounded in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it clarifies that government reform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ternal factors (social demands,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policy trends) and internal driver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enhancement). The study then traces the reform's progression from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ervices to public service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demonstrating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The reform's achievements inclu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while profoundly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conclusion, Zhejiang's "One Visit at Most" reform provides instructive insigh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es as the key catalyst, user-centric approaches form the core value,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with legal safeguards constitute essential foundations.

Keywords

government reform; one-stop service; digital government;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最多跑一次”：浅谈地方政府改革之浙江实践

祁子又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香港

摘要

本文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政府改革”的典型范例，浅析了数字时代下我们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实行路径，核心特点以及治理成果。本文首先根据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综合分析，明确政府改革是社会需求、技术环境、政策走向等外部要素的影响和政府职能转变、能力加强等内部要素相互推动而产生的结果。其次，文章研究整理了改革进程的内容，其始于行政审批服务，慢慢拓展到公共服务，监管执法以及政府内部运作等领域，展现出系统整合，协同共进的特性。最后，政府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在改善行政效率，改良营商环境，增添公众获得感方面成绩明显，还深刻促使政府完成数字化转型，做到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而言之，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可以得出政府改革的指引性经验：数字化转型是关键激发力量，以用户为导向是价值所在，系统思维和法治保障是重要依靠。

关键词

政府改革；最多跑一次；数字政府；治理现代化

1 政府改革的理论维度与驱动要素

1.1 政府改革的理论维度分析

政府改革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从宏观角度来讲，这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战略性布局相关；从中观角度看，这是对政府组织架构设置进行改善的体现；而从微观视角出发，这关乎政策执行效果，公共服务品质以及内部运作流程的持续完善等内容，学者何增科就曾表明，“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建立现代政府治理体制，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民主治理和有效治理水平”[1]。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关于治理理念，组织架构，制度机制以及方式方法的重大变革。而改革在应用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光谱式分布状况，一

边是渐次推进的，由工具理性引领的“技术性微调”，这种调整重点在于利用诸如早期办公自动化或者当下数字技术之类的信息技术，去提升既定流程的效率，如把纸质申请表单转为电子化，做到在线办理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另一边则是激进的，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起来的“根本性变革”，这样的变革也许影响到整个治理模式的转变，目的在于解决深层次的系统性的矛盾和难题。

1.2 政府改革的驱动要素分析

政府改革一般都要由内外要素相互推动，首先，外部要素是改革开始的关键助推剂：其一，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是主要动力源泉，民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以及监督意识会转化为动力推动改革；其二，时代潮流变化为政

府改革提供新机遇,如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新,不但给政府改革供应了全新的技术手段,还引起了治理环境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正如米加宁等学者于2020年提出的观点,即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新的“空间”——“数字空间”的形成,而社会治理与服务在数字世界的探索,即“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也在逐渐展开[2]。其次,内在要素对于改革能否持续推进并收获长效成果十分关键,其一,政府自身职责的转变属于核心推动因素,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以及发展阶段的推进,政府的角色逐步由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向现代的“服务者”过渡;其二,政府能力的优化是其改革的根基和目标,其中涉及吸收专业人员,参考先进经验,搭建技术平台来巩固组织的“硬实力”,同时关乎借助转变行政理念,营造革新文化,完备奖励体系来优化组织的“软实力”。总之,智能化时代下的政府改革,其深层意义在于形成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进而驱动政府的决策模式,组织架构以及运作方式的进步发展。

2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动因

2.1 外部推力:社会期待、技术条件与政策机遇

从外在原因看,社会期待是重要推动力,浙江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民营经济发达,但企业和民众在日常经营及生活时,“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度是常见痛点,提高行政效率是众望所盼,正如赵光勇等学者指出:“政府行为依然是从管理本位出发,为民服务的理念没有真正得到贯彻”[3];其次,完备的信息技术为改革提供了关键支持,浙江省具备坚实的互联网产业基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深入赋能商业和生活,这成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因。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奖励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与制度空间。我们推进“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抓手,三管齐下,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对行政监管机制进行优化创新,落脚于施政为民的行政本质,加快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4]。这一政策给地方改革指明了战略方向。浙江省在该领域首先冲锋,塑造范例,既响应了中央号召,又从改革当中收获珍贵的政策福利和发展机会。

2.2 内生动力:效能压力与转型需求

从深层内部原因看,根源在于政府自身转型的需求,如徐超等学者针对财政压力促使政府支出效率优化展开的研究,虽然该研究着眼于财政范畴,但其表现的“压力—效率”转换逻辑在更为宽泛的政府改革范围当中同样适用,即变内部压力为动力[5]。一方面,政府自身需要更新任务和职能,随着浙江经济不断发展,以往靠要素投入和政策优惠来推动发展的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政府对自身能力的塑造有着迫切需要,改革前,政府部门常常存在交流壁垒的情况。“信息孤岛”是制约“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调,而在

现阶段,“信息孤岛”的背后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权限问题,而是跨部门协调产生的管理问题[6][7]。解决各部门、各地区条块割裂、系统林立的现象,关键在于加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全省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政务服务标准,及时总结、推广实践有效的地方经验[7]。可以说,推进“最多跑一次”,实际上是对政府部门内部运作机制实施“倒逼式”改革,促使各部门冲破行政壁垒,整合信息资源,加强内部运行效率和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这既是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关键所在。

3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进程与核心特征

3.1 改革进程:从流程简化到整体智治

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标志性的阶段:第一阶段(2016-2017年)是启动与攻坚的时期,重点关注行政审批,商事登记,民生服务等领域,以公布“最多跑一次”清单、推行“一窗受理”为核心,在数据协同、事项清单、规范化运作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可扩展的体系[8]。第二阶段(2018-2019年)属于深化并拓展的时期,本次改革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范围从政务服务拓展至公共服务、司法与党群服务等领域;二是目标从“跑一次”升级为“一次不用跑、办更快、办更好”,当前关键在于攻克“数据共享”障碍,为“一证通办”“全域通办”等服务筑牢数据根基。第三阶段始于2020年并持续至今,处于数字化转型及整体智治时期,改革与“数字化改革”战略深度融合,“浙里办”针对公众服务,“浙政钉”关乎政府内部协作,重点打造“掌上办事之省”和“掌上办公之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服务和智能监管,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预测,迈向整体智治,这体现出“数字空间”政府形态的初步轮廓。

3.2 核心特征:用户导向与系统重构

此次改革在实践中呈现出若干鲜明而深刻的核心特征:其一,该改革以人民为中心,把抽象的“政府效能”概念化为具体实在的“生活便利”,为企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了方便。其二,该改革并非简单地把技术搬运过来或者只是将线下流程照搬到线上,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技术促使制度变革”的复杂特性,比如制订并实施《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使得改革有据可依,稳步前行。其三,该改革不再局限于单个部门或者单一环节的局部改良,始终秉持整体性治理的思维,经由“一窗受理”来促使跨部门横向协同,凭借“基层治理四平台”创建去推动县乡纵向贯通,依靠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来冲破层级与区域壁垒。学者刘淑春强调“数字政府涉及诸多条线和模块且与外界存在实时互动,是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9],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先从改良外部服务着手,以数据共享为重要支撑,渐渐向政府履职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拓展,并表现出了较强的用户导向,数